

“厅壁记”的源流以及李华、元结的革新

[韩]赵殷尚

当我们讨论唐代古文家的文体时候,往往把焦点集中在韩愈与柳宗元身上,许多学者从韩、柳古文中寻找文体革新上的发展轨辙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,除了韩、柳之外,也有不少唐代古文家对文体革新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去年,我在韩国学术杂志《中国语文学论集》中发表“元结在文体革新上的表现及贡献——以山水记文及山水铭文为主”^①,介绍了韩、柳之外较受重视的唐代古文家——元结在文体革新上的表现及贡献。这一次想承继去年的研究成果,讨论前人不太注意的文体——“厅壁记”的源流,以及核心人物李华、元结在此文体革新上的表现。

一、“厅壁记”的源流

所谓“厅壁”是指官府的墙壁,而写在它上面的文字则称为“厅壁记”,或“厅记”、“厅壁题名记”,其内容主要记述官府的由来与现况,以及历任官员的姓名、经历、政绩,以为纪念并供后任官吏参考。唐人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则云:“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,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,原其作意,盖欲著前政履历,而发将来健羨焉。故为记之体,贵其说事详雅,不为苟饰。”^②据考,“厅壁记”始于唐代,唐代以前的总集或别集都未收录此体文字;宋人编的唐人总集《文苑英华》才始载录“厅壁记”这一类的文章,它将厅壁记分成十七类:中书、翰林、尚书省、御史台、寺监、府署、蕃镇、州郡、监军使、使院、幕职、州上佐、州官、县令、县丞、薄尉、宴飨^③。它的范围由中央官府到地方官府,从高级官府到低级官府,无所不包。“厅壁记”在唐代已成为文体之一。

就属性而言,“厅壁记”本属于官方的文字记录,或是具有纪念性的记载,因此扬善者多于贬恶者,或者雕琢文字、粉饰事实者居多,唐人吕温说:“壁记

①《中国语文学论集》,第34号(2005年10月),第385-400页。

②(唐)封演:《封氏闻见记》卷五,《古今注等六部合订本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年,第23页。

③(宋)李昉等编:《文苑英华》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42-45页。

非古也。若冠绶命秩之差,则有格令在;山川风物之辨,则有图牒在。所以为之记者,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,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。代之作者,率异于是,或夸学名数,或务工为文。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,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。春秋之旨,盖委地矣”^①。唐人封演亦云:“而近时作记,多措浮辞,褒美人材,抑扬阅阅,殊失记事之本意。韦氏《两京记》云:‘郎官盛写壁记,以纪当厅(一作“时”)前后迁除出入,寢以成俗。’然则壁记之由(一作“出”),当是国朝以来,始自台省,遂流郡邑耳”^②。身为唐代人,吕温与封演对当时厅壁记的描述应无虚言。

李华、元结之前,杜颀、孙逖、张景、李白等人已经撰写厅壁记。杜颀的《兵部尚书厅记》作于开元二十九年,其文云:“二十一年冬十二月,诏工部尚书李公典之……八年而北虏平……是用陈既往之烈,系今来之美,以书于壁。”二十一年指玄宗开元二十一年,从此顺推八年则是开元二十九年,故将它系于此年。

孙逖有《吏部尚书壁记》与《鸿胪少卿壁记》等二篇:《吏部尚书壁记》云:“皇帝在位之二十二年,缺其官,选于众,乃命武都公自兵部尚书拜焉。公地惟宗英,才则人杰,忠孝自律,矜严成宪,式是轨度,谅惟衡石,国之利也……列为壁记焉”^③。二十二年指玄宗开元二十二年,由此可知此文作于开元二十二年以后;《鸿胪少卿壁记》则云:“兰陵萧公”^④。此人指萧颖士的从叔,姓名未详,萧颖士曾为他写了一篇《为从叔鸿胪少卿论旱请掩骼埋啗表》,此篇作于开元二十九年,故《鸿胪少卿壁记》应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以后。

张景有《河南县尉厅壁记》一篇,《全唐书》称他:“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,官侍御史”^⑤。现存文二篇,其《河南县尉厅壁记》云:“太原王昭度,字世范,登进士第,为河南尉。”王昭度无生平资料,也不知何年登进士第。而从此文中可揣测王昭度是张景的旧友,也是开元时登进士第的,其文末云:“尉之职,无所不举焉。然诚不足展世范之才,顾其所得,亦斯民幸矣。世范于景有旧,因求记刻于厅壁,庶有信于后,于是乎书”^⑥。县尉是在开元、天宝年间进士及第或制科登第者初任的官职。王昭度是张景的旧友,而张景擢书判拔萃科的时间大约在开元时,因此可说:除非王昭度中第的时间太晚,他登进士第且任河南县尉的时间大约也是开元时;即使《河南县尉厅壁记》的写作时间不在开元时,亦不会晚于天宝十四载,因为安史之乱后写的“厅壁记”或多或少都会提及战乱时

①(清)董诰等编:《全唐文》卷六二八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6339页。

②(唐)封演:《封氏闻见记》卷五,第23页。

③《全唐文》卷三一二,第3169页。

④《全唐文》卷三一二,第3169页。

⑤《全唐文》卷三九七,第4054页。

⑥《全唐文》卷三九七,第4055页。

候的情形,尤其是地方官府的厅壁记。

李白《任城县厅壁记》的写作时间,有二种说法:其一,詹锳说:“当是初游东鲁时作”,并系于开元二十四年^①;其二,安旗说:“归东鲁后作于任城”,并系于天宝九载^②。现在看来,二人的说法似乎都不正确,因为:首先,李白《任城县厅壁记》云:“白探奇东蒙,窃听舆论,辄记于壁,垂之将来”^③。显然此文是李白在初游任城时所作,并非归东鲁后所作,否则不可能写“垂之将来”之语,以期再来;第二,詹锳承继王琦《李白年谱》^④,并加以修订,将李白初游东鲁的时间系于开元二十四年,然从施逢雨先生所考的李白生平来看,李白初游东鲁的时间并非开元二十四年,而是开元二十八年五月;离开东鲁的时间则是开元二十九年春^⑤。故李白《任城县厅壁记》系于开元二十八年五月至隔年春为是。

从以上资料可看出,“厅壁记”的产生是在开元末,或是天宝初。

不过,李白与孙逖等人在“厅壁记”的创作上未免有“多措浮辞,褒美人材,抑扬阅阅,殊失记事之本意”(唐封演语)之嫌。李白《任城县厅壁记》说:

风姓之后,国为任城,盖秦之古县也…隋开皇三年,废高平郡,移任城于旧居。邑虽屡迁,井则不改…帝择明德,以贺季真宰之。公温恭克修,伊顾有立,季野备四时之气,士元非百里之才。拨烦弥闲,剖剧无滞。镛百发克破于杨叶,刀一鼓必合于桑林。宽猛相济,韦弦适中。一之岁肃而教之,二之岁惠而安之,三之岁富而乐之。然后青衿向训,黄发礼履。耒耜就役,农无游手之夫;杼轴和鸣,机罕吨蛾之女。物不知化,陶然自春。权豪锄纵暴之心,黠吏返淳和之性。行者让于道路,任者并于轻重,扶老携幼,尊尊亲亲,千载百年,再复鲁道。非神明博远,孰能契于此乎?白探奇东蒙,窃听舆论,辄记于壁,垂之将来。俾后贤之操刀,知贺公之绝迹者也。^⑥

孙逖《鸿胪少卿壁记》则云:

鸿胪汉官,掌蛮夷归义者,致其饗飨,辨其等威。在周为大行人,在秦为典客,在汉为鸿胪,其属有译官及郡邸丞长。洎后魏太和中,九寺各置少卿两员,掌副卿事。亦由传称亚卿,书载三少,制位或差于伯仲,受任同归于师长,成务赞礼,择贤而居,即其义也。帝唐亮采立政,稽古命官,柔服远人,绥厥有众,肃慎来贺,渠搜即叙,示之以干羽,通之以冠带,允谐是职,岂易其人?非夫野王之政理,元成之经术,德儒之明识,元方之令望,则曷

①詹锳编著:《李白诗文系年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4年,第19页。

②安旗:《李白全集编年注释》,巴蜀书社,1990年,第1943页。

③《全唐文》卷三五〇,第3543页。

④王琦则说:“开元二十三年…已而去之齐、鲁,寓家任城。”(见王琦注:《李太白全集》卷三五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1583页。)

⑤施逢雨:《李白生平考索(下)》,《清华学报》,新23卷第4期,台湾新竹,第394页。

⑥《全唐文》卷三五〇,第3543页。

由臻兹。兰陵萧公,朝之俊德,触邪秉德,人之雅重,草议为郎,入掌王言,出膺方牧,帝咨惟允。公实来斯,且有皇华之命,适表兼人之美,乃求旧官守,敷陈代迁,明授任之有章,示名器之无假,自嗣圣已后,记于壁焉。^①

他们的叙述方式是:首先描写官府的由来,再记述历任(或现任)官员的姓名、经历,最后表彰官员的政绩,以此作为纪念。因此可以说:他们的厅壁记纯属朝廷上的官方文字,或是谄媚之语,若把它们作为历史档案,或许可以谈出价值来;但若只针对文学作品来看,除了首创之功,则毫无意义可谈。

三、李华、元结的革新

李华有《著作郎厅壁记》、《河南府参军厅壁记》、《安阳县令厅壁记》、《御史大夫厅壁记》、《御史中丞厅壁记》、《衢州刺史厅壁记》、《临湍县令厅壁记》、《杭州刺史厅壁记》、《常州刺史厅壁记》、《寿州刺史厅壁记》、《京兆府员外参军厅壁记》、《中书政事堂记》等十二篇“厅壁记”,其中前十篇均写于天宝以后,后两篇虽然无法系年,但从他人朝廷任官的时间(天宝二年)来看,此二篇的写作时间不得早于此年^②。元结有一篇《道州刺史厅壁记》,此文也写于天宝后。

如前所说,李华、元结以前的厅壁记纯属朝廷上的官方文字,或是谄媚之语,谈不上文学价值来,而李华与元结的厅壁记则不同凡响,另开了新的样式出来,他们虽然未完全脱离前人的窠臼,也写了官府的由来与现况,以及历任(或现任)官员的姓名、经历、政绩等文字,但不同于前人的厅壁记,他们在文中提出了社会问题。李华在《中书政事堂记》中说:

自君弱臣强之后,宰相主生杀之柄,天子掩九重之耳,褒理化为权衡,论思变成机务,倾身祸败,不可胜数。^③

据李华所记,政事堂拥有大权,可视之为权力核心之集中点:若有政令或施政上的问题,可在政事堂议论,并可改之,甚至可定“诛”、“杀”,这可以说是阻断皇帝专制的极佳方法;若不善加利用,则会造成以下犯上、天子不闻国事的局面,这无疑是国家机构的弊病,也是社会的大问题。

相对于李华提出国家问题,元结则指出了地方政府的问题,他在《道州刺史厅壁记》中说:

天下太平,方千里之内,生植齿类,刺史能存亡休戚之。天下兵兴,方千里之内,能保黎庶,能攘患难,在刺史耳。凡刺史若无文武才略,若不清廉肃下,若不明惠公直,则一州生类,皆受其害。于戏!自至此州,见井邑邱

①《全唐文》卷三一二,第3169页。

②孙望、郁贤皓也主张《中书政事堂记》是天宝中李华在长安为官时所作。见孙、郁主编:《唐代文选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4年,第640页。

③《全唐文》卷三一六,第3203页。

墟,生人几尽,试问其故,不觉涕下。前辈刺史,或有贪猥昏弱,不分是非。但以衣服饮食为事,数年之间,苍生蒙以私欲,侵夺兼之,公家驱迫,非奸恶强富,殆无存者。^①

元结并未遵循前人所定的厅壁记窠臼,也没有叙述官府的由来与现况,而直接谈到了刺史的问题,及其解决的方法,他认为:所谓刺史应该“清廉肃下、明惠公直”,并具“文武才略”,而前辈刺史则只会“贪猥昏弱、不分是非”。元结在厅壁记上对官府进行的如此大胆的批评实为难得,可说前无古人。因此吕温在《道州刺史厅后记》中称赞他说:

河南元结,字次山,自作《道州刺史厅事记》,既彰善而不党,亦指恶而不诬,直举胸臆,用为鉴戒。昭昭吏师,长在屋壁,后之彼贪虐放肆以生人为戏者,独不愧于心乎?予自幼时读古循吏传,慕其为人,以为士大夫立名于代,无以高此。前年冬,由尚书刑部郎中出为此州,虽履剧自课,而未能逮其意也。往刺史有许子良者,辄移元次山记于北牖下,而以其文代之,后亦有时号君子之清者莅此,熟视焉而莫之改,岂是非之际,如是其难乎!^②

吕温是中唐后期的文人,也是独孤及的再传弟子(因为:吕温曾“从安定梁肃学文章”^③,而梁肃则师从独孤及^④);与元结似乎并没有师承关系,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(元结卒于大历七年;吕温则生于大历七年),更没有理由谄媚元结。吕温认为元结《道州刺史厅事记》与众不同,“既彰善而不党,亦指恶而不诬”,可作为“鉴戒”。相对于“多措浮辞,褒美人材,抑扬阅阅,殊失记事之本意”的当时厅壁记,元结此文的确是能以一字为褒贬、别出心裁的佳作。

李华与元结之后,许多古文家都写了厅壁记,例如独孤及、梁肃、吕温、权德舆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元稹、白居易、沈亚之、皇甫湜、杜牧,始于李华、元结的厅壁记就此几乎成为文体之一。因此褚斌杰对唐代的厅壁记总括地说了这样的话:“出自名家之手的某些厅壁记,却也写得有声有色,不落常套,不同凡响,如唐代韩愈的《蓝田县丞厅壁记》就写得别具一格”^⑤。唐代古文运动的大将韩愈能够写出如此令人称道的《蓝田县丞厅壁记》,无疑是李华与元结的功劳,换句话说,若无李华与元结的开拓,则不会有韩愈的厅壁记。

作者单位:韩国明知大学中文系

①《全唐文》卷三八二,第3875页。

②《全唐文》卷六二八,第6339页。

③《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序》,《全唐文》卷六〇五,第6112页。

④梁肃在《祭独孤(及)常州文》中自称:“门生安定梁肃”。(见《全唐文》卷五二二,第5306页)。

⑤褚斌杰:《中国古代文体概论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2年,第358页。